



# 宋代太学与文学研究

A Study on Taixue  
and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牛思仁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海外借

# 宋代太学与文学研究

*A Study on Taixue  
and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牛思仁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太学与文学研究 / 牛思仁著. —杭州:浙江  
大学出版社, 2021. 6  
ISBN 978-7-308-21423-0

I. ①宋… II. ①牛… III. ①教育制度—研究—中国—  
宋代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宋代 IV.  
①G529.44②I20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99336 号

## 宋代太学与文学研究

牛思仁 著

---

责任编辑 宋旭华  
责任校对 周焯楠 蔡帆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良诸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64 千  
版 印 次 2021 年 6 月第 1 版 202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1423-0  
定 价 7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本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青年基金项目『宋代太学与文学研究』资助

(项目编号: 17YJC751025)

## 目 录

第一章 宋代太学发展演变(上):科举化趋势 .....	(1)
第一节 解额因素:太学求学目标与科举的必然结合 .....	(2)
第二节 依附关系:太学教学、考试受制于科举 .....	(7)
第三节 制度影响:太学制度设置与科举 .....	(11)
第二章 宋代太学发展演变(下):自主化悖反 .....	(15)
第一节 悖反基础:科举改革机遇与太学制度完善 .....	(15)
第二节 悖反争论:太学科举的优劣存废之议 .....	(18)
第三节 悖反意义:太学自主存在价值的实现 .....	(27)
第三章 无官御史:太学与两宋和战之争 .....	(58)
第一节 主战:太学生群体与和战之争 .....	(59)
第二节 悖反:爱国情怀与政派利用 .....	(66)
第三节 反观:太学内部与时政关系 .....	(70)
第四节 思辨:太学生议政之纷纭众说 .....	(75)
第四章 宋代太学诗歌与太学生活 .....	(82)
第一节 盛事留篇什:释奠、落成、幸学 .....	(83)
第二节 朝齏暮盐叹:贫苦清薄的物质生活 .....	(89)
第三节 何如咏沂水:丰富愉悦的精神生活 .....	(94)

第五章 宋代太学诗词的文学文献价值·····	(111)
第一节 太学色彩、融合丰富、太学记忆：太学诗歌的特有功用 ·····	(111)
第二节 以词言志、以词言谐、以词言情：太学词作的自我价值 ·····	(119)
第六章 宋代太学文·····	(127)
第一节 臣僚制诰文与幸学文·····	(127)
第二节 学官辞免文与谢启文·····	(134)
第三节 臣僚奏疏文与师生《书》《记》文·····	(140)
第七章 太学经历与文人影响论例——周邦彦与太学考论·····	(174)
第一节 周邦彦太学履历考·····	(174)
第二节 周邦彦太学生活考·····	(178)
第三节 周邦彦太学文学论·····	(182)
附录一 宋代太学演变史简表·····	(191)
附录二 宋代太学诗词辑录·····	(204)
参考文献·····	(282)

# 第一章 宋代太学发展演变(上): 科举化趋势

太学是我国古代以传授和研习儒家经典为主、培养经世治国人才的中央官学高等学府。历代以来,太学始终代表着某一时期国家教育的主脉,它的兴衰成败也折射出朝廷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中国古代太学发展流变史中,宋代太学实有承前启后之功,具有特殊历史地位,达到太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我们在宋代教育大框架内,深刻认识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太学发展演变自始至终受到科举的巨大影响,因而,基于太学与科举的衔接碰撞、互动影响,探究宋代太学发展演变进程,对于我们全面探论宋代太学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从宋前太学制度来看,西汉武帝于元朔五年(前 124)创建太学,本意重在培养经世人才,太学发展史表明其“养士”特征实与汉代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等由官吏举荐人才的“取士”制度并无强烈的依附与影响关系。然而,随着隋唐科举制的创设发展,太学与科举的紧密关系日益凸显。虽从整体来看,宋代仍延续前朝此种特点,但却有其不同隋唐、异于明清的自我特征。明清时期的二者关系几近绝对化的依附:

自明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矣。国学、府学、县学徒有学校之名耳!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sup>①</sup>

---

<sup>①</sup> 璩鑫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0 页。

而处于隋唐与明清之间的宋代太学,既受科举全面影响而与其相衔接,又在与科举起伏不断的争斗中与其相悖反。

宋代太学受到科举制度的深刻影响,宋人早已深有体悟。赵汝愚认为,中兴以来虽“建太学于行都,行贡举于诸郡”,然多“奔竞之风”,微“忠信之俗”,士人对待太学的态度可谓“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究其原因,“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科举取士显然比太学养士更受士子青睐。<sup>①</sup>兵部侍郎虞俦批评科举制下的太学教育名存实亡,“若以为化民成俗,长育人材,自学校始,祖宗以来,莫之有改,奈何使之名存而实亡乎”<sup>②</sup>。历代以降,科举与学校关系紧密,即如正史《选举志》中既有科举制度,又含学校教育。当今学者更深入认识到宋代科举与教育的密切关联。“在科举与外部环境的诸多联系中,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当首推教育。”<sup>③</sup>“一些学者便将唐宋元明清的教育统称为‘科举时代的教育’,实际上简直可以称之为科举教育。”<sup>④</sup>《科举教育的传统与变迁》<sup>⑤</sup>就是称其为“科举教育”基础上的专著。宋代教育依附于科举,“南宋的教育理念、社会心态与科举功能完全融为一体。在这种境遇中,教育焉能不成为科举的婢女”<sup>⑥</sup>?古今学人之论述给我们传递出二者紧密关系的明确信息,考察宋代太学与科举发展的实际情形,我们发现宋太学的科举化倾向日趋明显,二者之间的诸种关系存在明显的衔接性特征。

## 第一节 解额因素:太学求学目标与科举的必然结合

太学职能从宋初的单纯“养士”扩至熙丰兴学时的“养士”兼“取士”,

① (元)脱脱:《宋史·选举志三》卷一五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71页。

②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五五《学校考》,现代出版社1986年版,第820页。

③ 廖平胜:《考试是一门科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④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⑤ 田建荣:《科举教育的传统与变迁》,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 苗春德、赵国权:《南宋教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真正实现“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但若除去天下皆以三舍取士的崇观兴学阶段,其他时期内由舍选而取士者实属凤毛麟角。大部分太学生仍然需要通过科举入仕。太学养士最终目标自然是培养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人才,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养士子之直接出路就是授官入仕。既然其出路主要依赖科考,太学生极为重视科举就不言而喻。更何况,这其中有关键性的衔接,就是太学解额。

宋代科举之开科,从发解试开始。“所谓‘发解’,即各地将报考进士、诸科(北宋前期)经考试合格的士子(此时统称‘举子’),按解额发送到尚书省。”<sup>①</sup>宋代发解试既实行于诸路州府,亦包含国子监、太学等教育机构。而太学解额作为太学与科举的重要衔接,其最大特点就是有着比诸路州府更宽优的解额数。解额之重要性,事关科举考试中的名额限制,取不上解额就意味着无法参加科考的第二等级考试即省试,仕进之路基本堵死。太学解额之优,宋文献记载颇多。《梦粱录》卷四将南宋后期两浙、国子学、三学的取解额对比论列:

两浙运司寓试士人约一百名取一名,有官文武人及登仕郎十人取一人,国子牒试则五人取一人,太、宗、武学士人约四五人取一人。<sup>②</sup>

朱熹亦说:

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试者,以其本州解额窄而试者多,太学则额阔而试者少。<sup>③</sup>

嘉定六年(1213)臣僚奏言提及取解之优处,“自太学及胄子之外,则有诸路漕试尔”<sup>④</sup>。凡此皆说明,太学解额较州府等地更优。

伴随着两宋科举考试的改革发展、科场解额的增减变化,太学解额数

①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3页。

②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解闹》,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③ (宋)朱熹:《朱子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0页。

④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359页。

也在长时期的太学取解试中屡有变动。在三年一开科成为定制之前,因有一年、二年甚至四年之先后变革,包括太学在内的天下解额多有“解十之四”、“解十之三”、“解及五分”、“解发四分”等之变动。如嘉祐三年(1058)时的解额数,“开封府进士二百一十人,诸科一百六十人;国子监进士一百人,诸科一十五人;明经各一十人”<sup>①</sup>。自太学重建后,国子监解额多指太学解额,此时期之开封府解额远过于太学。而随着历次兴学及朝廷的日趋重视,太学逐步将开封府解额划归于己。熙宁八年(1075)诏“开封府、国子监举人,并就一处考试,仍以两处解额通计取人”<sup>②</sup>。元丰二年(1079)诏“自今解发进士,太学以五百人,开封府以百人为额”<sup>③</sup>。此时太学解额已远超开封府。至元丰三年(1080)又诏“开封府解额并拨属太学”<sup>④</sup>,其后虽有变动,绍圣三年(1096)再诏“开封府解额,今后依元丰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指挥,并拨属太学”<sup>⑤</sup>。南宋以降,太学解额有更优趋势。朱熹就曾批评解额不均之突出问题:

如今太学解额七人取两人。便七人取一人也由我,十人取一人也由我,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取一人也只由我,而今自立个不平放这里,如何责得人趋?

(太学)正试既优,又有舍选,恩数厚,较之诸州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何其不公至于此!<sup>⑥</sup>

太学可七人取解两人,而诸州或五六百人取解一人,如此悬殊的解额差异,难怪朱熹甚为太学外的求解士子发不平之鸣。

①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285页。

②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545页。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一,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319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〇,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512页。

⑤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548页。

⑥ (宋)朱熹:《朱子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0页。

太学解额优越之外,免解制度也是士子争相竞趋之缘由。所谓免解,即科考士子免除发解试后,直接参加省试。这就意味着,自仁宗嘉祐二年(1057)科举殿试“皆不黜落”之后,免解士子只要能通过省试,就已经一脚踏入仕途。免解至少为士子扫清漫长而艰辛科考路上的一半障碍,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免解制度虽实施于天下士人,但很显然,太学免解恩例远比地方优越。其一,幸学免解。宋历朝统治者皆有临幸太学之举,伴随而来则是推恩免解。“主上登极,则临幸学宫,奠谒先圣,及赐诸生束帛,学官斋长谕俱沾恩霈。”<sup>①</sup>今查两宋历次幸学事件,多有诸生免解之恩例。徽宗大观元年(1107)“文武学生授官、免省试、免文解、赐帛有差”<sup>②</sup>、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幸养正、持志二斋,两斋长谕已免解人,特与免省;未免解人,与免解恩例;其两斋生,并免将来文解一次”<sup>③</sup>、理宗淳祐元年(1241)“诸生推恩、赐帛有差”<sup>④</sup>等。若蒙皇帝幸学,便有免解可能,故而学官、太学生求幸学者不乏其人。其二,遇赦、贺寿免解。绍兴二十九年(1159)皇太后圣寿八十,太学等诸生上表称贺,诏“两学大职事十六人并永免文解,两学小职事四十五人、府学正录三人,并免解一次”<sup>⑤</sup>。孝宗淳熙三年(1176)礼部言,“大小职事,该遇庆寿赦,参酌推恩人,内舍生永免文解”<sup>⑥</sup>。同年南郊赦,太学生“先请后免,或先免后请,可并与免将来文解一次”<sup>⑦</sup>。其三,太学上舍下等生免解。熙宁时曾诏上舍生在学一年者可免解,元丰二年(1079)学令将上舍正式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免解。其后虽有变动,但直至南宋重兴太学,仍规定上舍下等免解。

太学解额之优越与免解之恩例,对诸生求学目标产生极为重要的影

①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五《学校》,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

②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0页。

③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五《学校》,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

④ (元)脱脱:《宋史》卷三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15页。

⑤ (宋)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517页。

⑥ 苗书梅等校:《宋会要辑稿·崇儒》,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⑦ 苗书梅等校:《宋会要辑稿·崇儒》,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响。太学生源之充足与招考竞争之激烈,归根于科举解额带来的强大吸引力。即便在官学教育几近荒废的北宋初期,生徒散归,无一二十人居常听讲者,然每当科场诏下,前来国子监报名入学之官员子弟常达千余人。这显然是解额带来的巨大变化。历次兴学后,太学走上不断上升发展的正轨,特别是允许百姓子弟中俊异者补考之,这对向来无资格报考、只能千辛万苦挤科考的普通士子无疑是大好消息。因而,愈来愈多的求学者涌向太学。经历北宋三次兴学运动,南宋太学发展虽已明显不如北宋规模,但士子报考之热情丝毫不减。南宋三舍生数额维持在千余人,补招名额更是有限,然士人补考数额历次上万,嘉泰二年(1202)更达三万九千余人,迫使朝廷不得不在传统的混补法与新实施的待补法之间轮换开考。如此激烈的考试形势,别无他故,皆因解额而来。解额之宽优自然带来及第之优势,且太学所占解额及第之概率又远超州府。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列举仁宗嘉祐三年(1058)、嘉祐五年(1060)、嘉祐七年(1062)各地解额及录取数据比例,兹选录如下:

勘会近岁三次科场内:嘉祐三年,国子监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人,约五人中取一人。京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约三十一人中取一人。河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四十四人,全无人及第。……嘉祐五年,国子监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约四人中取一人。京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约三十人中取一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进士三十二人,全无人及第。……嘉祐七年,国子监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一十一人,及第者三十人,约四人中取一人。陕西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约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五十四人,及第者一人。<sup>①</sup>

从录取比例 5 : 1 与 31 : 1、44 : 0 的醒目对比中,显见朝廷对于太学解额与及第比例的有意倾斜。

<sup>①</sup> (宋)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12 页。

太学养士之思想价值理念,其初衷本在注重培育诸生的德操修养。然在科举影响下,特别是宽优的解额因素,将其价值理念一改为通过太学取得解额。由此,实现太学生求学目标与科举考试的必然结合。正是这种结合赋予太学诸生较大的科考优越性,促使士子竞相奔入,由此带来太学发展问题及地方州府解额的不公正现象,也遭致宋时人的批评。“利之在,人谁不趋?”<sup>①</sup>解额制度的设置,导致太学生源、在学目标及太学发展等,显然都受到科举制的重大影响。

## 第二节 依附关系:太学教学、考试受制于科举

宋代太学制度在科举影响下发展演进,还突出表现在,体现和代表太学存在主体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基本依附于科举。其一,教学内容深受制约。从太学发展史来看,其教学内容向来以经学为主,两宋时期也未超出经学范畴,却与前代有着明显区别。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前代唯重先儒经学教材,而宋代经历由教授先儒经学到宋人经学著作的转变,进而将宋人编撰著作作为重要依据。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派争斗影响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影响太学内部的结果。王安石变法时期,其主持编撰的《三经新义》(《诗》、《书》、《周礼》义)由朝廷诏命颁付国子监雕印,传示天下。王安石并撰《字说》一书,“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sup>②</sup>。《三经新义》、《字说》初成,宋初以来科考所用《五经正义》、《九经疏义》等传统教材遭弃,四方士子皆习《三经新义》以备科考。考官唯以其为评判标准,稍有异说则黜之,欲中考者谁敢不习。此时太学内紧随科考步伐,教学所用一律改为王氏新学注疏。

神宗朝变法失败后的长时期内,受哲宗、徽宗、钦宗朝政局变化影响,

<sup>①</sup> (宋)朱熹:《朱子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0页。

<sup>②</sup> (元)脱脱:《宋史》卷三二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41页。

程(颐)学、王(安石)学之争轮番上演。若程学派占据有利政治地位、主持科举,则采用传统教材兼程颐《易传》、胡安国《春秋传》等;若王学派主政、把持科举,则仍以王氏新学为主要参照。太学教学内容以科举为导向,在程学、王学之间不停转换。

南宋宁宗嘉定以后,程朱理学终被确立为官学意识形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成为诏颁天下、官方认定的科考标准教材,“内外学校之官,令于士子程课之外,迪以义理之学,厉以行艺之实”<sup>①</sup>。理宗淳祐元年(1241)幸视太学时下诏: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sup>②</sup>

这一时期,太学教学紧跟科举倾向,《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立为官学课本,且在其后数十年、甚至元、明、清诸朝未再有大的改动。纵向来看,《九经疏义》阶段、《三经新义》阶段、程王替换阶段、《四书章句集注》阶段,构成宋代太学教学内容的不同时期划分。它既是太学内部教学设置的反映,更是政治与科举影响下导致的结果。

其二,太学考试从形式到内容皆受科举影响。太学内部实施三舍法制度,就是将诸生按等级差别隶属外舍、内舍与上舍,通过私试、公试、舍试等多种考试依次升舍。私试每月一考,按“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轮换考校科目。公试每年一考,按“初场以经义,次场以策论”分作两场考试。舍试两年一考,专指内舍升上舍的考试。不同考试因其重要性差异,考校官由太学学官升至朝廷差官。考试制度多遵照科考,实行弥封、誉录、锁院等一系列制度,考试场次也沿用科考。因科举或纯以经义取士、

①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五,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484页。

② (元)脱脱:《宋史》卷四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07页。

或以经义和诗赋取士,向来以经义为主的太学考试,也在特定时段内将诗赋作为考试内容。嘉祐时期,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提及“学者之讲说,章句而已”,“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sup>①</sup>,这种变化完全是出于适应科举考试的结果。在科举实行经义、诗赋分科取士的元祐八年(1093),太学诸生两千一百七十五人中,只习经义者才八十二人,其他两千余人皆兼习诗赋。太学如此局面离不开科举的影响。更甚者,宋人有时将太学与科举自然地作为一个整体,议论相关的考试制度。南宋初期,国子司业高闾在制订南宋科考条例时,明言“今参合条具太学课试及科场事件如后”,将二者置列一处详论之:

第一场,元丰法(绍兴、元祐、大观同),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今太学之法,正以经义为主,欲依旧。第二场,元祐法,赋一首,今欲以诗赋。第三场,绍圣法,论一首,策一道,今欲以子、史论一道,并时务策一道。为三场,如公试法。<sup>②</sup>

从考试场次、所依旧法到经义、诗赋、策论的具体道数皆同,这已超越影响范围,成为完全照搬。考试内容的具体学术倾向,则紧跟科举考试与太学教学内容的不断变化。教学仅是太学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环,而考试直接影响诸生的前途命运,故而更受重视、更为敏感。太学生若不能准确把握主考者的意图动向,稍有不慎便满盘皆输。“专尚程颐之学,士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或“(大臣)阴佑王安石,稍涉程学者,至一切摒弃”<sup>③</sup>。

其三,太学师生编撰科举用书。科场用书既有官方编纂,也有书坊私编。官方所编纂参考书目,旨为士子提供标准和范式,对于场屋文字具有导向性作用。这类用书往往由国子监颁行于众,且由学官负责汇编,“令监学官公共精择旧来时文谨严而有法度、精粹而有实学者经义、诗赋、论策各若干篇,许令版行,以为程式”。所选时文的涵盖范围甚广,包括太学

① (宋)王安石著,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21页。

② 苗书梅等校:《宋会要辑稿·崇儒》,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③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317页。

生所作，如崇宁二年(1103)臣僚奏言，唯有府、监发解、省试并太学补试、公私试第一名经义，方许印行颁布四方。除此之外，书坊私编书中，太学生所编科考用书因太学特殊地位亦风靡于世。太学上舍生、笃信斋斋长方颐孙编有《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其书今存，前有淳祐九年(1249)陈岳序曰：

乡先生方君府博(颐孙)，莆中之文章巨擘，萤窗雪几间哀集前哲之雄议博论，取其切于用者百有余篇，以《百段锦》名之，条分派别，数体具备，有助于学为文也。<sup>①</sup>

宝祐五年(1257)太学生谢维新编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从其编者身份、内容编排等来看，无疑是场屋用书。《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一收录有《璧水群英待问会元选要》八十二卷，《提要》曰：“其书为太学诸生答策而设，故有‘璧水群英待问’之名”，并且批评此种“策套”现象，“南宋待太学之礼最重，而当时相率诵习者乃此剽窃腐烂之书，其亦大非养士之意矣”<sup>②</sup>。另外，《续修四库全书》著录《太学增修合璧联珠万卷菁华》一百四十卷，此亦科举用书。以上几种书目编写，皆与太学相关，这些编书在太学内部就很盛行，更是流传至全社会供举子诵习研读。如某生向朱熹说：“今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外，其他未尝过而问焉。”朱熹道：“怪它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sup>③</sup>可见，南宋以来学校师生自编时文册子以备科考，这已是一种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大多数师生对此处之泰然，也有看其不惯而欲行抵制者，太学博士彭龟年就是其中一位。其时，“有谏大夫同知贡举，欲大变文格，下太学选经义、诗赋、论策各二百篇为式”<sup>④</sup>。选篇职责降至太学学官时，彭龟年对此坚决反对，说：“使士明经术，熟古文，则文格自正。校文已为下策，又使之习时文，此非所谓教也。”不惜忤

① (宋)方颐孙编：《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页。

② (清)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子部类书类存目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62页。

③ (宋)朱熹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四卷，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431页。

④ (宋)楼钥：《楼钥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6页。

逆谏官,然最终未再选之。总之,太学师生所编撰、受欢迎于太学内外的科场用书,既因受科举影响而产生,又反过来影响科举风气。

### 第三节 制度影响:太学制度设置与科举

太学诸项制度的创设与实施,旨在其内部自身的良好发展,与外界本无牵涉。但在科举制强大的影响力下,一系列的太学制度皆渗透科举因素。

其一,学官管理制度的制订与科举相挂钩。遴选太学学官之途径,在两宋不同时期先后采取荐举、考试等方式,除考察其品德修养、学术才能,是否熟习举业也是能否拟任的重要衡量标准,科考具体成绩纳入任职太学的前提条件。元丰七年(1084)太学实行选录学官考试制度,有资格报考者,或为科考等级试中“进士第一甲,或省试十名内,或府、监发解五名内”,或是太学内部“公、私试三名内,或季试两次为第一,或上舍、内舍生,或曾充经谕以上职掌”,舍此之外皆不得报考。考中者以成绩分列上、中、下等,并依次任博士、正、录职。可以说,这场考试就是聚集科场优秀者而举行的又一次本质相同的科考,只是专门针对太学学官而设。考试法如此,荐举方式也多强调科考身份。元祐二年(1087)在取消学官考试而荐举人职时就明确规定,被荐者必须为进士出身。拟任学官,朝臣为其所撰制诰文也体现出科举考虑,如刘克庄将“科目之高”等视为拟任太学的有利条件:

尔科目之高,人物之胜,擢诲诸生,士论翕然,曰国子监不寂寞矣。(《方登太学录制》)<sup>①</sup>

尔自为诸生,每一篇出,纸价为贵。(《陈栩国子博士制》)<sup>②</sup>

① (宋)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七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87页。

② (宋)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七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038页。